私立基督教燕京大學歷史系所初探（1919－1952）

查　時　傑

一、前　　言：

對於一個以作育英才，培養歷史學方面研究與教學人才爲目的的歷史系所而言，在北京設立的私立燕京大學歷史系與歷史研究所，從民國八年(1919)開始創設到卅三年後的1952年時被調整院校而告結束爲止，① 卅三年來辦學的成果，於今可以作出一個歷史的整理與回顧；一者分析其辦學的過程，看看在基督教教會大學的辦學宗旨下，是否也可以在中國辦出一個頗具學術水準的歷史系所來，培養出優秀而傑出的史學人才來；再者由於燕京大學的辦學，在多所基督教教會大學中具領導與舉足輕重的地位，影響所及，也關係著其他多所基督教教會大學辦學的成敗，故燕京大學歷史系所辦學的成效，實有指標的作用，有待作出客觀的驗証；三者由於燕京大學是私立的院校，與國內的國立大學院校有很大的區別，基本上，無論校園面積，校舍建築，圖書設備等硬體條件，和師資陣容與學生素質等軟體條件，乃至學雜費用方面，國立大學都佔有絕對的優勢，但燕京大學歷史系所辦學的績效，越來越能被外界所肯定與博得好評，不僅能與國立大學的歷史系所並駕齊驅，

① 王百強整理，〈燕大北平復校後的行政負責人與教師陣容〉，文收《燕京大學》1945－1951年級校友紀念刊，北京，1994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甚而有所超越,② 此一事實更是有研究與探索的必要，故本文僅就有關的資料，如燕大師生們的回憶錄，燕京大學的校方有關檔案，社會與學者的公評等，整理出其辦學的過程，作成必要的詮釋初探，以明其所以然。

二、燕京大學設立初期所面臨的難題：

燕京大學的歷史系所是燕京大學轄下的一個單位組織，由創立到正式運作，先得談及其母體——燕京大學的設立，而燕京大學的初創時，問題重重，但又以下面的三個問題最具關鍵，現依次道出如下：

1. 燕京大學的初創階段——三校合併後的新校名問題

燕京大學的初創階段，可用“創業艱辛”來形容它，原本在中國北方重要都市的北京地區，十九世紀來華傳揚基督新教的教會（Protestant Church）陸續在該地區設立了“華北協和大學（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1904)，“匯文大學（Peking University)”（1888)，和“協和女子大學(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for Wemen)”(1904）等三所教會大學，到民國八年（1919）三校合併而成“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故而合併後介紹該學府的專文中有云：

> “燕京大學的沿革，和別的學校比起來，有很大的一個異點，因爲它不是一系相承，乃是由協和女子大學，匯文大學，協和大學，三個大學合成的，這三個大學，又各有它的沿革，若細細的說起來，未免太煩雜了。”③

---

② 胡適著，〈從私立學校談到燕京大學〉，文收《獨立評論》，第108期，民23年7月。

③ 謝婉瑩、瞿世英、劉萬芳合著，〈燕京大學〉，文收《生命》，第二卷第一、二期，19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京地區三所基督新教所辦的教會大學的合併，自有它的時代與環境的動機，因爲：

> “——，如匯文大學（1890年），華北協和大學（1904年），華北女子協和大學（1904年），但規模都不大，故就發展的潛力來衡量教會教育的未來，十分不樂觀，唯有行聯合之實，才有美好的前途。”④

但雖有合併的共識，在從倡議到正式的合併，其間所遭遇的困難與阻礙，竟超出一般的意料之外，如爲合併後新校名的名稱問題，就爭論不休，連匯文與協和兩校的學生都參與了爭論，⑤ 而合併後的首任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其《司徒雷登回憶錄——在中國五十年》一書中，就語帶沈痛又無奈地說：

> “兩個傳教士集團中間的純粹內部論戰，因爲堅持自己要用那應當屬於另外一間大學——一間正在使自己成爲中國的知識界發電站的大學——的校名，而劇烈爭執，這無意識的舉動，祇能使自己貽笑大方而已。”⑥

最後經過多次的協調，授權由不屬“協和”與“匯文”的北京學界中的五位公正學者，即蔡元培、吳雷川、胡適、傅增湘和王厚齋所組成的“五人校名

---

④ 查時傑著，〈燕京大學推行全人教育之研究——從建校到校名問題談起〉，文收《全人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傳播中心出版社，1996年），頁133。

⑤ 王明道著，（1900－1991）爲協和的學生，《五十年來與重生眞義》（臺北，臺灣浸宣出版社，民國82年），頁32。

⑥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著，中文譯者名不具，《司徒雷登回憶錄——在中國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臺北，新象書店，民國73年），頁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委員會”，作成最後的決定，⑦ 他們接受了中國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誠靜怡牧師（1881－1939）之提議，提出“燕京大學”爲新校名，結果爲全校師生所接受，司徒雷登再回憶說：

> “——誠靜怡博士，提議用‘燕京’二字，這兩個字的意思是古時燕國之首都，早被全中國的人公認爲北京的另一個充滿詩之代名，這個名字很快地成爲中文，英文討論中所用的名字，而且每一個人都認爲滿意。⑧

燕京大學至此解決了“正名”問題，校方從此方能全力以赴地朝向辦學之路邁進。

2. 燕京大學的初創階段——三校合併後的校址，師資與學生問題

燕京大學的成立既是三校合併，所以校址問題接踵產生，理想的校址應是另覓一個新校址，新建校舍，如是未來才有發展的空間，燕京大學建校後就是朝此方向努力，最後也獲致在這方面極大的成功，日後燕京大學在硬體設施上，無論校園的環境，校舍的建築都 獲得校外校內各界的肯定與讚揚，如：

> “在基本建設方面：1926年燕大從盔甲廠遷入了海淀的新校園，這片校園占地78畝，1936年發展到1200畝，建築基金達500萬美元，校園內矗立著一座座以捐贈者名字命名的宮殿式建築，湖光塔影，美不勝

⑦ 徐兆鏞著，〈創校之艱辛〉，文收《學府紀聞——私立燕京大學》（臺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民國71年），頁61。

⑧ 同⑥。頁49－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收，在當時國內大學首屈一指。”⑨

但從合併後到遷入海淀新校址的七年創校初立階段（1919－1926），在校址問題上，也倍嘗艱辛，西元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燕大年刊》，其中〈校史〉中有云：

“——。校址位於北京東城盔甲廠，房舍隘陋，經加工葺改後，乃可使用。——，北京協和女子大學亦實行合併，校址暫設東城燈市同福夾道，距盔甲廠約二英里。”⑩

而早屆畢業的校友回憶中，也坦白道及初創時的種種侷促狼狽的境況，如：

“燕大初設時的環境，僻處在盔甲廠的幾幢小屋之中，談校舍還不如匯文中學，圖書館則斗室二間；實驗室則一樓一底二間；生、理、化均在其中了。如是設備，就是掛著 Peking University 大招牌的燕大前身；——。我們當時做學生的，那裏夢想到現在堂皇燦爛的燕大學府。”⑪

又有老校友追憶說：

“我再說到校舍，是一個二十丈見方的圍牆，裏面包括一所課室，三行

⑨ 陳時偉著，〈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文收《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首屆中國教會大學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169。

⑩ 轉引自王百強著，〈燕京大學校名與校址若干史料辨析〉，文收《燕大文史資料—第四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2－3。

⑪ 張　銓著，〈祝司徒先生六十大壽〉，文收《燕大友聲》，第二卷九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平屋，一所廚房連著飯廳，和一間辦公室而已。學生合計不過百人，教職員不滿二十——，在世界上，大學裏恐怕無此窮苦簡陋的了。"⑫

燕大合併後一切都因陋就簡，在新校址出現之前，教學上還得男校，女校分開授課，只有少數的幾門課採合班授課，⑬ 這些不正常的教學現象，也造成學校教育行政資源上的浪費，必需在男，女兩校各別設立行政單位以運作，同一課程且需兩地重授，採合班授課又有勞女生上兩里之遙的男校聽課，這些看似小問題的問題，也會嚴重影響燕京大學未來正常的發展。而初創時期的燕大，其硬體設施帶來種種的大小問題之外，在軟體的師資與學生上，亦有著許多問題存在；師資陣容不佳，就吸引不到優秀的學生前來就讀，今再依合併後出任英文文學系系主任的包貴思（Miss Grace Boynton）所撰寫的〈司徒雷登博士傳略〉一文中，對當初創校時的追憶曾描述云：

> "那時的燕大是一無可取的，——沒有教員也沒有設備。——充滿了騷擾與紛亂，學生不到百人，教員只有兩位中國人（陳在新博士與李榮芳博士）。許多西方教員不合於大學教授條件。這新事業的經濟方面更是使人沮喪，預算是五萬元，收支卻只有兩萬五千，那就是說常年經費有一半是落空的。"⑭

也是創校元老之一的劉廷芳教授（1893－1946），在題爲〈教會大學辦學之困難〉一文中，也說出了合併後初期的情況，提及說：

---

⑫ 白序之著，〈我所認識的司徒博士〉，文收《學府紀聞——私立燕京大學》（臺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民國71年），頁4。

⑬ 冰 心著，〈我的大學生涯〉，文收《燕大文史資料——第一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3。

⑭ 包貴思（Miss Grace Boynton）著，謝冰心譯，〈司徒雷登博士傳略〉，文收《燕大校友通訊》，第一九六三年，頁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才：初時全校教職員男女合計只三十三人，——；經濟：初時只有二萬五千元常年經費，至東城土堆中十餘座舊屋，廿萬基金已幾乎在地皮上耗盡，圖書數百本，——；政策：初時完全是教會的差會的一部分，與中國政府不生關係。——；學術程度：初時在學術界未得人的注意，——；組織：初時只有男女兩校與宗教學院三部，尚未統一融和。——。董事會：初時完全是以西人爲主，並係差會之西人爲主，華人幾無插足餘地，其權限亦極有限。——。"⑮

以上有關燕京大學合併後的初期情況，使首任校長司徒雷登的親朋好友都勸他婉拒出任校長職位，不必去收拾這個破爛攤子。⑯ 所以燕京大學成立後，就必需要去面對無數急待解決的學校有關的硬體與軟體的設備問題。

3. 燕京大學的初創階段——三校合併後的教會教育的問題

燕京大學既由三間中小規模的教會學校合併而成，故教會教育的宗旨，在合併後的燕京大學中仍要維持與實踐的，因爲作爲一個基督新教各差會（Missionary Society）所聯合支持下的教會大學，無論從傳統的傳承來看，必然要繼續以基督教的思想來辦教育；再從教育資源的取得上來看，因與基督教會的支援關係又是密不可分與互爲表裏的，所以燕京大學要貫徹與實踐"基督教教育"與"教會教育"的目標，有著要遵守在華所開過的"全國基督教會議"中有關教會教育決議的義務，而該決議爲：

"教會教育事業，當以養成學者爲基督徒之人格，培植青年克成社會上有用之人物，造就教會中學術優良之士，與教會各職之領袖。欲達此目的，有必要之事項二：一爲學校內須養成基督教之風範。二於教會所設各校中教員與一切機關，務求完美。二者實爲相輔而行，非一方.

⑮ 劉廷芳著，〈教會大學辦學之困難〉，文收《燕大友聲》，第二卷九期。

⑯ 韓迪厚著，〈司徒雷登略傳〉，文收《學府紀聞——私立燕京大學》，頁 1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面所能奏效。”⑰

然按照這種決議而行，燕京的辦學就有再落入“傳教”重於“教育”的舊窠臼之可能，也有變成“神學院”的可能；幸好在稍早的清末（1911年），曾奉命受派組團由美國專程來華調查教會教育的芝加哥大學神學院教授巴頓（E.D.Burton），於調查中就發現這種現象，他的發現被學者描述爲：

> “他發現宣教士在學校中工作，最大的興趣或目的是宣教，結果把智識的訓練從屬於靈性的訓練，他認爲把智性次於靈性是非常危險的做法，學校很快會因此而變弱，處於低水平的狀態之中；巴頓更質疑宗教指導課必修的推行，以及相對中國學校而收較低廉的學費，這一作法只會帶來負面的影響，令學生有一個錯覺，以爲上宗教必修課是交低學費所作出的代價。”⑱

但巴頓提出的調查報告，在時間上還在“全國基督教會議”之前，所以對中國的教會大學之辦學方針與目標，仍不足有所影響；幸而十年後的民國十年（1921）九月，巴頓再度率領“巴頓調查團”前來中國，對基督教教育再進行全面的調查時，因著內外在環境的改變，其影響力就展現了出來，該次的“巴頓調查團”被描寫爲：

> “調查團先後曾在中國三十多個主要城鎮進行實地考察，訪問了大量的教會，公立和私立學校，在切實感受到中國民族主義熱情高漲，以及兩後春筍般湧現的新式學校給教會教育機構帶來的威脅以後，調查團

---

⑰ 基督教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14年）》（臺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橄欖文化基金會聯合出版，民國72年），頁66－67。

⑱ P.A.Varg:《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p.91. N.Y. Octagon Books. 19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單提出要改革中國教育，而且還重新考慮教會辦學的宗旨和目標，調查報告不是針對某一團體或個別機構而言，而是就總體教育給予指引，考慮中國的實際需要，提出一個比較廣闊的辦學目的，在中國人民的社會，道德倫理，知識，經濟，政治和宗教生活各個方面，去推行全面的教育工作，透過良好的宗教課程，適當的輔導及完善的組織，使同學獲得更完整的訓練；初辦學的時候，只重個人宣教（Personal evangelism），進入二十世紀則推廣至社會性的宣教（Social evangelism），把基督教生活實踐在社會群體中。"⑲

由於"巴頓調查團"對中國基督教教育現況的研究，並提出許多具體的改革建議，這對正面臨合併設校後的"燕京大學"而言，在必需面對實施的"基督教教育"的問題上，無異是一場及時之雨，否者必然會再走入傳統的"基督教教育"中，把"傳教"置於"知識傳授"之上，又因襲外國的教育模式，忽視中國本地社會對教育上實際之需要，而專業 的師資也過於缺乏等等的弊病也將再度重演。而燕京大學身爲基督教教會大學，在面對處理"教育"與"宣教"的問題上，又在面對處理"教育"與"教會"的問題上；一則因緣 於時會，及時搭上基督教教育改革的列車；二則因緣於人和，得著燕大的中外核心同仁的有力支持，解決了極不容易處理的教會大學辦學上的難題。取得在"教育"與"宣教"、"教會"之間的新均衡點。這對燕京大學未來的發展與前途，影響絕對是深而遠的，燕京大學接受"巴頓調查團"的建議，重新調整"宗教與教育"的關係，亦就是"教會教育"在燕京大學有新的詮釋，作了大幅的改革；其中校長司徒雷登扮演了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司徒雷登本人就是"巴頓調查團"十六名成員中的一位，又以身爲長期在華從 事

⑲ 譚潤明著，《燕京大學成立前後辦學目的的轉變》（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碩士論文（自印本），1994年），頁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基督教教育者的實際經驗,⑳ 使司徒雷登在“調查團”中所提的意見，極受重視，故而形成了下列的一種情況，即:

> “——，對於報告中的建議是肯定的，事實上建議中有些項目基本上就是他的要求，諸如提高教師資量，課程的重新設計和編排，行政組織上增加中國籍老師比例，著重學校環境的基督教氣氛，而不是基督教條文和死板的崇拜儀式等等。”㉑

而在司徒雷登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對於在燕京大學從事“基督教教育”的改革，有許多著墨之處，敍述頗爲詳盡，其中說到:

> “——，我要燕京在氣氛方面和它的影響方面都能繼續徹底基督化，同時不成爲似乎只是宣傳運動之一部。學校中不應當有必需參加的早禮拜，也不應該有強迫參加的宗教聚會，不因爲一個學生宣佈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就給他在學業上佔甚麼便宜，也不因爲有一個學生拒絕信教，就給他在學術上的障礙，燕京大學必須成爲一個能夠應付一切考驗的眞正大學。” ㉒

回憶錄中還說到:

> “在這裏，眞理被不束縛地傳授給學生，信仰和信仰之外表的表示，被視爲個人的事。——，燕京向被校內人士和一般社會人士視爲基督教學校；不管那些個人對基督教的態度如何。我們盡力證明，合適的大

---

⑳ 司徒雷登在出任燕京大學校長之前，常期在南京的“金陵神學院”入任教，見謝景升著，《司徒雷登先生年譜》。

㉑ 同⑲。頁66。

㉒ 同⑥，頁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標準與公佈的基督教宗旨並非不能並立，——。”㉓

對於上述改革理念的實踐，燕京大學落實的作法就採用設立“燕京大學基督教團契”的組織方式㉔和設立“宗教學院”的方式㉕來區隔過去“基督教”與“教育”間錯綜複雜又糾纏不清的關係，此後凡有志於基督教神學研究，或將來有志於在教會服務者，自可到“宗教學院”就讀；而校內的基督教一切的活動，則透過“燕京大學基督教團契”這一個組織來運作，而該“團契”組織的定位，接任司徒雷登校長之職的吳雷川校長，曾說及：

“本團契係由教職員學生以及工人自由集合，完全脫離學校行政範圍，雖爲學校所承認的團體，絕非學校法定的組合，——。”㉖

至此，燕京這所在中國由基督教衆多差會所支持而成立的高等學府，透過上述的種種方式，把該校的“基督教目標”與“教育的目標”有所區隔與各自的再定位，再由各自運作中，走出一個可以相輔相成的雙贏的目標來。

總之，燕京大學初創時期所面對的挑戰，雖然來勢洶洶，但司徒雷登校長與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外教授，有著相同的辦校理念，也對所面對的挑戰有其共識，亦即司徒雷登校長在回憶錄中所提及的：

“在嘗試建立一個理想中的大學，我的工作似乎有四個方面：一、基督

㉓ 同⑥，頁64－65。

㉔ 同⑥，頁65。又見查時傑著，〈燕京大學基督教團契初探〉，文收《基督教大學教育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

㉕ 同⑥，頁69－70。又見趙紫宸著，〈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文收《眞理與生命》。

㉖ 吳雷川著，〈燕大基督教團契的成立與中國教會的改造〉，文收《眞理與生命》，第一卷第十期，民國十五年十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教目標；二、學術標準和職業訓練課程；三、與中國環境之關係和對於國家諒解之善意的貢獻；四、學校的經濟來源與物質設備。"⑰

燕京大學的辦學目標與方針既定，各學院之下的系所單位，就朝此總方向，在充分授權下，齊心努力以分頭邁進了。

三、燕京大學歷史系與歷史研究所

燕京大學歷史系與歷史研究所的設立，自是先成立歷史系，再到適當時間，各方條件齊備與成熟後，成立歷史研究所，其由籌備到設立的過程，分別以設立、師資、課程與學生四方面來說明；

1. 從設立到茁壯 (1920－1937)

從起初三校合併而爲燕京大學時，歷史系就設立了，所以它是創校時的元老院系之一，時在民國九年 (1920)，不過因爲那時的燕京，仍處在男校與女校分兩地上課的時代，所以男女兩校各設有歷史科系，今依據民國十一年所刊出的一篇名爲〈燕京大學〉的介紹文，文中對有關的院系，曾指出說明云：

> "歷史學系現在的主任是王克私博士，本年所有的課程有"現在之歐美"、"邁爾通史"等。明年尚擬以 H.G.Wells 的歷史學大綱 (The Outlines of History)，爲根據而系統的研究世界歷史云。"⑱

上文所介紹的爲男校的歷史系，而女校的歷史系，則介紹說明爲：

---

⑰ 同⑥，頁64。

⑱ 謝婉瑩、瞿世英、劉萬芳合著〈燕京大學〉，文收《生命》，第二卷第一、二期，頁6，19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史科有康女士（Dr. Kendall），她是 Wellsley College 派來的教員，除了女校的英文歷史班以外，還有合班的 Current Events 她自己演講以外，還有時請外界名人來演講。"㉙

當時燕大設文科、理科、神科三科，文理兩科收二年的預科生與四年的本科生，畢業則可得學士學位，而神科收三年的本科生，畢業則可得神學士學位，預科生要修滿八十個單位（有如今日之學分），方可畢業，文理本科生要修滿一百四十八個單位方可畢業，㉚ 歷史系隸屬於文科之下，由於歷史方面的課程亦屬基本課程之一，所以創校後就成立的歷史系，除了要負責歷史系的教學外，還要承擔全校本科生及預科生用英文講授西方歷史的任務。㉛

初創時期的首任系主任爲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教授，其餘的教師，除陳垣教授爲中國籍外，全爲外國籍者，又以來自美國者居多，故而歷史系中的課程，開設外國史或西洋史者多，而講授的語言自亦多用英語爲主。記錄中首屆又首位提出畢業論文的杜聯喆女士就是以英文來寫作的。而第二與第三兩屆中，侯振鏞、李崇惠、張天澤與張印堂四位也是用英文來寫作的。㉜ 故而歷史系辦學的方向，明顯地是以西洋史爲主，但師資陣容仍不夠堅強，教師的學經歷也有限，所以還看不出在未來發展上的潛力。

燕京大學歷史系的茁壯應與洪業教授（1893－1980）應聘到校，和全校遷往海甸新校址有關，洪業與燕京大學結緣於民國十一年（1922），由洪業晚年口述爲主，撰寫而成的《洪業傳》中，曾提及有云：

"一九二二年，洪業接到劉廷芳自北京寫來的信，劉君在一所剛創立不久的基督教大學任教。他興奮地告訴洪業，該校的校長，劉君多年的

㉙ 同㉘。頁 9。

㉚ 同㉘。頁 3。

㉛ 齊文穎著，〈燕京大學歷史系的經驗——學術上的成就與貢獻〉。

㉜ 〈本系歷屆畢業論文題目表〉，文收《史學年報》第三卷第一期，頁 1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良師益友——司徒雷登，將到美國來一趟，並要親自去訪問洪業，聘他做該校教員。劉廷芳勸洪業回中國與他同心齊力把這大學搞好。不久司徒雷登果然來到，他和洪業一見如故，兩人對基督教，對教育，對中國的看法都吻合。洪業便被聘爲燕京大學教會歷史助理教授，但答應在美國多留一年幫助燕京大學副校長亨利魯斯爲學校募款。"㉝

而上文提及介紹洪業入燕京大學的劉廷芳教授，則與洪業爲留美同學，兩人在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爲同學，又是同一個基督教兄弟會（Fraternity）"十字架與寶劍（Cross and Sword)"的核心會員,㉞ 更是"成志社"創社會友,㉟ 故多年的同道與同學的關係，又復爲志同道合有著爲祖國與基督教會奉獻的心志，這使先回中國燕京服務的劉廷芳，積極向司徒雷登推薦他的好友，從而促成了洪業應聘來燕京的幾近一生的服務。

洪業於民國十二年（1923）返國，是年九月正式到燕京服務，很快就得到司徒雷登校長的信任，除了在歷史系任教外，也在宗教學院教"歐洲宗教史"，次年（1924）出任文理科科長，也就是教務長，主管當時燕大男校（文理科）這一部分，它與女校，宗教學院（神科）合成燕京的三大主體，女校主管爲費賓闈臣（Alice Frame)，宗教學院主管爲劉廷芳，三個單位之上，就是由司徒雷登擔任校長，總攝內外校務的運作。司徒雷登、劉廷芳、洪業三人都對燕大的茁壯，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㊱

洪業出任燕大的教務長，不僅規畫與執行了全校的校務發展,㊲ 對於他

㉝ 陳毓賢著，《洪業傳——季世儒者洪煨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一年)，頁104。

㉞ Susan Chan Egan:《A Latter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1893 - 1980)》, p.p.59 - 6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London, 1987.

㉟ 吳相湘著，〈成志會促成中國現代化〉，文收《民國縱橫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頁143 - 159。

㊱ 同㉞。pp.99 - 100。

㊲ 同㉝。頁123 - 138。第十一章，〈燕大教務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隸屬的歷史系，自亦不例外，他也出任代理系主任與系主任，主持了系務，使改革系務的工作更爲落實，首先他把歷史系的教學與研究方向，由側重西洋史，轉到中、西歷史並重，亦即是他的門生之一的劉子健教授在追念洪先生的文章中所說的：

> "洪先生以爲中體西用的主張不妥，應當是中西並用。換言之，要使中體演進，西學合用。他做院長，定下方針，首先要把兩個學系辦好。一是國文系，後來盛極一時。二才是歷史系，側重國史，但學生必須通英文，注意外國的方法。——。"㊳

有了辦學方向，洪業接著就在師資的延聘上努力，民國十五年（1926）的師資陣容爲：

> "1926年秋季開學伊始便增添了著名教授王桐齡來歷史系主講國史鳥瞰，名家孟世傑主講秦漢史，大家梁啓超（兼職）主講古書之眞僞及其年代問題。再加上原來的洪煨蓮主講史學方法，陳垣主持中國歷史討論班，外國教授仍繼續發揮專長如王克私主講西洋史，新聘英國教師謝迪克（H.Shadick）主講英國史與英國殖民地史。"㊴

再從一份正式的資料中來看，即於民國十六年（1927）時，在呈教育部請准立案的公文中，燕京大學的國文、歷史、哲學三系教授的陣容爲：

> "國文：吳雷川（副校長兼系主任），周作人，容庚，馬鑑，許地山，謝冰瑩，俞平伯，沈士遠，黃子通，楊振聲，顧名。

㊳ 劉子健著，〈洪業先生：少爲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文收《歷史月刊》，第十七期，頁79。

㊴ 同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史：洪業（系主任），費賓閏臣，王桐齡，王克私，李瑞德。
哲學：趙紫宸，馮友蘭，陳垣，徐寶謙。”㊵

唯實際的教學上，王桐齡並未應聘來校授課，在《洪業傳》中，洪業曾回憶說：

“我們兩人（指王克私與洪業）中應教中國歷史的自然是我，但我覺得自己不夠資格，便得司徒雷登與行政委員會的支持，支付一筆款來聘請一個眞正的中國歷史教授，王桐齡，他不肯來燕大，卻推薦了一個學生，常乃德。常乃德來了，但我對他印象不好，他像個乾癟了的書生，頭髮亂七八糟，臉也不刮，長年穿一件破爛的藍布大褂。——。在宿舍分配了房間給他住，他在裏面整理講義，很少出來，我也很少理會他。我太太和我常請其他教員來吃飯，可是我記不得有沒有請過他，教了一年，他大概也覺得沒受到賞識，就辭職了，我也沒費力氣留他，心裡想走了就算了，結果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之一。這個人後來成爲青年黨的臺柱，是憲法運動中很重要的人物，又建立了新的歷史學派，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而我卻錯過了他。”㊶

民國十七年（1928）之後，又聘到鄧之誠、顧頡剛、錢穆、張星烺、張爾田、容庚、方壯猷、許地山等教授；㊷ 彼輩皆爲在學術領域上已卓然有成者，燕京大學歷史系能吸引他們前來應聘，除了燕京大學環境優美的新校舍，圖書資料充實完備等原因外，待遇上的優渥也大大增加延攬優秀師資的有利條件。《洪業傳》中也提及洪業在這一方面的貢獻，傳中有云：

㊵ 《教育部高等教育檔——燕京大學檔》。（民國十六年）
㊶ 同㉝。頁114。
㊷ 同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堅持燕京大學付他與外國教員同等的薪水，——。
除了教書外，洪業在一九二三年還致力改進燕大圖書館，因爲圖書館的中文書，除四書五經外什麼都沒有，英文書則差不多只限於聖經評注，很少有學術方面的書。——。
在北京當時找書最好的地方是琉璃廠的舊書店，——，洪業深感燕大需要那麼多基本參考書而沒錢買，便想起他的關朋友紅毛公（Pinkie），寫信提議他捐錢建立一個'唐恩伯媽媽圖書館專款'（Mother Thornburg Library Fund）紀念他的母親；紅毛公寄了一千美元來，洪業收到樂極了，馬上到琉璃廠去帶了一車子的書回來。受到此鼓舞，洪業說服女院的院長費賓閨臣（Alice Frame）把兩萬五仟美元撥出買中文書。——。燕大圖書館後來成爲中國最好的圖書館之一。"——。
——，二十年代後期因北大經費短絀，教職員薪水一欠就是幾個月，燕京大學趁機會拉攏到不少北大教授，鄧之誠也到燕大來了。"㊸

又顧頡剛教授也在晚年所寫的〈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中，提到燕大的環境與待遇，使他定意由廣州前來燕大，他說到：

"當時因爲北大欠薪太多，生活太苦，我回北京後，就去了美國教會辦的'燕京大學'。燕大待遇很優，每月給我二百四十元工資，房子、電燈、電話等等，都不要錢，生活很好，我於是可以每日寫作。"㊹

在民國十八年（1929）之後，歷史系主任由洪業轉移到美藉李瑞德教授（Richard H. Ritter）手中，民國廿四年暑期新學期始業後，再由英藉的貝盧思教授（Burtt）出任系主任，洪業則於民國十九年（1930）後出任大學研究院

㊸ 同㊵。p.93 & p.131。
㊹ 顧頡剛著，〈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文收《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科主任職，負起領導全校碩士生的教務工作。[45] 故洪業與歷史系仍有著密切的關係，他一手規劃的歷史系辦學方向，仍由繼任的兩位外藉系主任蕭規曹隨地繼續運作著。而洪業的辦學方向，曾被指出在於：

> "——用新的科學方法研究歷史，重點發展漢學研究，中西歷史兼顧的新方向。"[46]

民國廿五年（1936）暑期後的新學期，由顧頡剛接任歷史系主任，顧對系務的未來發展曾提出新的意見，在致校長吳雷川、校務長司徒雷登的信件中，有云：

> "二日（七月），——，建議增聘講師，增設地理課，古物古跡調查實習課，並請史界名人講演等。"[47]

同年八月十七日，爲燕大歷史學系作年度預算書，訂出較上年度多五千餘元的經費預算，十九日，親往校務長室，面見司徒雷登，得其允准，遂能按原計劃進行增聘教師之事，把方由學校畢業未及數年的優秀同學如韓儒林、馮家昇、齊思和、譚其驤、張國淦等聘爲兼任講師，侯仁之爲助理。[48]
又陸續請到：

> "史學界名流來燕大歷史學會講演，先後有錢穆、雷海宗、蕭一山

---

[45] 翁獨健、劉子健、王鍾翰合著，〈洪煨蓮〉，文收《中國史學家評傳（下冊）》，（1985）
[46] 同[31]。
[47] 顧潮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255。
[48] 同[47]，頁2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49]

又在系內新開"古跡古物調查實習"課，與容庚、李榮芳兩教授共同主持，其目的在養成學生自動搜集材料的興趣，燕大師生利用週六下午，參觀北平各處的古跡，更利用週日假期，遠到涿州、張家口、宣化參觀。[50] 當時燕大主編的《燕京新聞》，曾報導說：

> "先生興濃步健，不後青年，態度和藹，招顧周到；沿途解釋勝跡，無嫌其煩，致使同學神往趣生，弗覺疲憊。"[51]

燕大歷史系就在顧頡剛接任系主任後，系務上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更上軌道，師生關係融洽，以致《史學消息》中，道出：

> "各方面都有新的計劃和設施，頗有一番蓬勃的氣象。他接待學生最誠摯，熱情就如一團火，燃燒了他自己，也燃燒了和他接近的每一個學生。——。課外的攀談，學生受益最多。——。又最能啓發學生自動研究的興趣，每一個受教的學生，差不多都能津津有味的說出自己一些被啓發的經驗來——這些經驗是最寶貴最受用的。"[52]

2. 從佔領下維持授課到被迫關閘（1937－1941）

民國廿六年（1937）七月七日爆發"蘆溝橋事變"，全面抗戰開始，燕大以位在北平的緣故，首當其衝；七月廿八日，日軍佔領了北平，顧頡剛因列名於日人欲追捕的名單中，故必需離開北平，乃將燕大系務於七月廿日交

---

[49] 同[47]，頁257－258。
[50] 同[47]，頁257。
[51] 《燕京新聞》，第三卷，第12期。
[52] 《史學消息》，第六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由洪業與貝盧思來掌理，[53] 同日晚間，離北平，往歸綏去。

在日本佔領北平的前四年（1937－1941），燕大全校的校務工作並未停頓，全校仍能弦歌不輟，而一般國立大學就無法享有這等際遇，被迫匆忙西遷到內地；個中原因在於燕京大學可利用其所具有的美國董事會的特殊背景，因佔領者的日本當局此刻尚與美方維持外交關係，故而不便控制與干涉到燕大的校務行政，就利用到這種微妙的美日關係，使燕京大學的學術自由方得以維持到“珍珠港事變”發生時的民國卅年（1941）年底。

燕大的歷史系，在此段日本佔領期間，配合全校的校務而運作，雖有一些師資上的變動，如顧頡剛教授等人的離去，但洪業、鄧之誠、容庚等教授皆留於燕大，沒有離開，幾位外藉教授亦然留校，使系中的師資陣容仍然能維持戰前的水準；其間系方承受日方的壓力，被要求聘請日藉教授以充任教職事，燕大歷史系的同仁想出了聘請知名於國際學術界的考古學家鳥居龍藏教授來校研究與教學方式，以應付日方，而鳥居教授素抱反侵略戰爭理念者，其應聘任職燕大期間，對其母國政府的侵略行爲，從不假辭色，亦捍拒日方要其宣傳的要求，燕大歷史系幸運地以此化解日方挑戰的危機。[54] 而鳥居教授的表現，使抗戰勝利，燕大復校後，校方幾無異意聘請鳥居來校教學與研究。

又本系所畢業的學業表現優異同學，蒙留校任教者雖自戰前已然開始，其在本階段時期內，亦然繼續遴選畢業同學留校任教，使燕大歷史系的師資來源不虞缺乏；如民國廿九年到卅年度（1940－41）又新聘了裴文中、翁獨健、聶崇岐、侯仁之、王鍾翰諸先生任教席，除裴文中之外，餘皆燕大歷史系所出身者。[55] 尤有進者，在戰前透由美國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es）支助，實施遴選歷史系所在民國廿年（1931）後各屆畢業的同學，

---

[53] 同[47]，頁277。

[54] 劉子健著，〈憶鳥居先生〉，文收《燕大雙週刊》，第五期，1948年二月二日。

[55] 程明洲輯，〈史學界消息—本校——歷史系消息〉，文收《史學年報》，第三卷第二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計劃，到本階段的年代裏，已然有陸續學成回國回母系任教者，如齊思和、翁獨健、陳觀勝、鄭德坤等人，使燕大歷史系所更不虞有師資人才上的缺乏；而自民國廿九年（1940）起，系主任由齊思和教授出任，更象徵燕大歷史系第二代已經長成，開始了其接棒傳承的另一新階段之起始；此外亦証明了前此的遠程目標，遣派系所畢業生赴國外進修以栽培未來師資計劃的正確性。而早期系內負系務行政的洪業教授，其高瞻遠矚使歷史系所的發展不至於在突來的挑戰之中受挫，也顯現出燕大歷史系所在發展上所具綿綿不絕的活力。

民國卅年（1941）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美國的珍珠港，此舉帶來了美日兩國正式宣戰，而燕京以往能持續辦校其來自美方的屏障也頓告失去，使日本開始對燕大展開了打擊與廢校的嚴厲手段，軟禁了司徒雷登校長，[56] 又捕捉了洪業（歷史系教授）、鄧之誠（歷史系教授）、陸志韋（研究院院長）、趙紫宸（宗教學院院長）、劉豁軒（新聞系主任）、蔡一諤（總務長）、張東蓀（哲學系教授）、陳其田（法學院院長）、林嘉通（教務長）、趙承信（社會系主任）、周學章（政治系教授）、侯仁之（歷史系教師兼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副主席）、劉子健（同學）等二十餘位的師生，[57] 結果司徒雷登被軟禁在北平長達三年八個月又十天，到戰事結束時才釋放出來，而十一位教授則被拘捕審訊長達半年之久後，於民國卅一年（1941）的六月十八日，由日本軍事法庭宣判，侯仁之回憶說到：

---

[56] 同⑥，頁 141－159，第八章，〈幽禁與獲釋〉。

[57] 燕大師生被拘捕審訊的情形，幾位當事人獲釋後，都寫有回憶的文章，可參考(1)鄧之誠著，《南冠紀事》，文收《燕大文史資料》，第一輯，1988 年。(2)趙紫宸著，《繫獄記》，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69 年。(3)侯仁之著，〈燕京大學被封前後的片斷回憶〉，文收《燕大文史資料》，第三輯，1990 年。(4)趙承信著，〈獄中雜記〉，文收《中大》雜誌，第一卷第八，九合期，1946 年。又其他相關著作，(5)陳毓賢著，《洪業傳——季世儒者洪煨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81 年。(6)〈陸志韋傳〉，編寫小組著，〈陸志韋傳〉，文收《文史資料選編》，第四十輯。1991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這時，洪師、鄧師和劉豁軒教授都已無罪開釋，陸志韋教授、趙承信教授都已取保出獄就醫，當天宣判的只有張東蓀教授、趙紫宸教授、陳其田教授、林嘉通教務長、蔡一諤總務長和我，判決結果，我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三年。”[58]

燕京大學因司徒雷登校長遭軟禁，以及各學院重要負責師長的被捕，校務只得停頓，使留守在北平的燕大教職員立刻面臨失業的嚴重危機，其間日方也利誘教授們出來到日方控制的大學授課，或爲日方各相關機構服務，但除了極少數的人變節外，大多數的教授，特別是曾被拘捕過再釋放出來的洪業、鄧之誠、陸志韋、趙紫宸、蔡一諤、趙承信、侯仁之等幾位教授都懍於民族大義，寧死不從；也因此在現實的生活上，面對經濟上極其拮据的窘況，大都靠典當度日，然而也堅忍地苦撐待變，耐心等待著戰爭的結束與勝利的來臨。[59] 燕大這批文史方面的教授，在傳遞知識的言教之外，也在身教上樹起新的典範。

在這段自“七七事變”後日本佔領北平，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爲止的四年時間內（1937－1941），燕大在日美間微妙的關係下，得以繼續維持，絃歌不輟，從而栽培了各系所的專業人才，歷史系所自不例外，培養出趙宗復、龔維航、王伊同、張德華、張仁民、鄭楨、郭可珍、李金聲、王鍾翰、程世本、杜洽、程明洲、許純鑒、勞同霞、陳瑜、徐素眞、劉淑珍、羅秀貞、湯瑞琳、陳絜、林樹惠等廿一位學士；又張誠孫、張瑋瑛、趙豐田、劉選民、陸欽墀、

---

[58] 侯仁之著，〈燕京大學被封前後的片斷回憶〉，文收《燕大文史資料》，第三輯，(1990)

[59] 同[53]。頁211－219。第十八章，〈抗日勝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蒙思明、葛啓揚、曹詩成、侯仁之、王鍾翰、王伊同等十一位碩士。[60]

3. 遷移成都復校（1942－1945）

就在北平的燕京大學遭受到日本強迫關閉之後的不久，燕大校友在西南方國民政府所在地的四川省重慶市，於民國卅一年（1942）二月八日開臨時董事會，會中議決：

> "㈠燕京大學在後方復校；㈡成立復校籌備處；㈢推梅貽寶先生爲復校籌備處主任。"[61]

梅貽寶先生在邀得韓慶濂與熊德元兩校友的共事下，終於在四川省成都地區，於民國卅一年（1942）十月二日順利復校開課，出任代理校長的梅貽寶教授，在其《大學教育五年一八十自傳》中，回憶到：

> "後方燕京校友董事，聽說燕京大學在北京遭敵人封閉，集會商討。一致決定在後方復校，共推余爲籌備主任，當時業已抗戰數年，民生疲困，——，恢復一大學，困難重重。經多方奔走磋商，地點選定成都。成都華西協和大學，係由美國及加拿大各基督教教會所協力創設。校園在成都城外西南隅華西壩，甚爲寬敞。惟在燕京進行復校以前，早有人滿之患。——。燕京大學再來成都，華西壩委實無法容納，只可另作別圖。幸蒙張岳軍（群）主席大力維持，得以租用陝西街華美中學小學兩所，並蒙撥給華陽縣文廟應用。復承華西大學支持，得以在

60　王鍾翰輯，〈史學消息（三）本系歷屆畢業論文題目表〉，文收《史學年報》，第三卷第一期。民國廿八年十二月。1939年。又程明洲輯，〈史學界消息—本校—歷史系消息〉，文收《史學年報》，第三卷第二期。民國廿九年十二月。

61　燕大成都校友會整理，〈抗戰期間遷蓉的燕京大學〉，文收《燕大文史資料》，第三輯，1990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華西壩進行理科課業。——。勉強成局。"[62]

梅貽寶代理校長的《八十自傳》中，還列有一份〈成都燕京大學各部門負責人表〉，唯表中獨缺歷史系負責人的姓名，[63] 然另一篇由"燕大成都校友會"整理的專文中，則列出由鄭德坤教授出任歷史系代理系主任職，王鍾翰教授出任秘書職，[64] 鄭與王皆爲北平燕大歷史系所畢業的校友。

在成都的燕京大學，全校設有文、理、法三個學院，復校的第一個學年，學生人數共計三百六十四人，其中一百五十位名額，提供給大一新生與轉學生，其餘則爲北平來的舊生，而前來應考者竟達三千人之衆，故全校十四個學系都能選有素質優異的學生，往後受限於本身的主客觀的條件，雖學生人數有所增加，但全校各系四個年級所收學生人數仍屬有限。又成都燕大共辦學四年（1942－1945），故而算上在成都入學和在北京入學成都畢業的四屆，其畢業總人數共約六百餘人，[65] 其中歷史系採小班制，故畢業學生一如在北平的燕大，各屆畢業人數維持在廿位以下，而師資陣容則頗有可稱道之處，除由北平前後到成都歸隊的三十餘位教職員外，還設置"特約教授"六位，敦聘知名大師來校施教，此六位教授爲：

"——有陳寅恪、李方桂、徐中舒、蕭公權、趙守愚、曾遠榮諸君子。"[66]

---

[62] 梅貽寶著，《大學教育五十年——八十自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一年），頁73。又有關燕大在成都復校史實，還可參考(1)吳其玉著，〈成都燕京大學的一些回憶〉，文收《燕大文史資料》，第一輯，1988年。(2)燕大成都校友會整理，〈抗戰期間遷蓉的燕京大學〉，文收《燕大文史資料》，第三輯，1990年。

[63] 梅貽寶著，《大學教育五十年——八十自傳》，頁75。

[64] 同[61]。

[65] 同[61]。

[66] 同[63]。頁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中陳寅恪教授來校主授隋唐史，徐中舒教授主授上古史，皆爲歷史系特約教授。

3. 北平復校到院校調整合併（1945－1952）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燕京司徒雷登校長於十七日被釋放出來，十八日就召開“燕大復校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此委員會成員很少，只有司徒雷登、洪業（原教務長，研究生院院長）、陸志韋（原研究生院院長）、蔡一謀（原總務長）、林嘉通（原教務長）、侯仁之（原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主席）六人，他們假東交民巷三官廟前的瑞士大使館王克私領事的府邸中舉行，[67] 王克私與燕京大學的淵源深厚，自燕京創校後，曾受聘爲歷史系，宗教學院的教授，又曾出任歷史系主任職，[68] 司徒雷登釋放後即暫住於此。該“燕大復校委員會”成爲復校的決策中心，《司徒雷登回憶錄》中，回憶道：

> “我實在無法找到一群比他們更爲有智慧，有警覺，有忠心的同事，當我提議我們應立刻在我們那已經被日本人劫掠一空的校園上作點什麼時，我纔知道他們早已擬定計劃了。”[69]

而“燕大復校委員會”實際上的運作情況，參與者之一事後回憶道：

> “這個委員會在司徒雷登主持下，整天都在研究討論和決定復校的全部工作，如建立工作機構，恢復原有建制，籌劃經費，任命工作人員，

---

67 喬維熊著，〈關於北平燕大復校經過的回憶〉，文收燕京大學校友會編，《燕京大學 1945－1951 年級校友紀念刊》，北京，1994 年。

68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頁 488。

69 同⑥。頁 160。第八章，〈幽禁與獲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聘請教師，接受並整修原有校園校舍和各項設施，恢復學系和年級，確定招生辦法和人數，規定開學日期——。

這些復校大事都由委員會討論，一經決定立刻執行."⑦⓪

八月廿三日，該"燕大復校委員會"委員們正式重回燕大校園，積極展開復校的工作，修復校園，校舍與教室，聘請教師，招考新生，就在短短的五十多天不眠不休的努力下，卒能在十月十日於燕大校區內的貝公樓大禮堂舉行了開學典禮，復校計劃順利完成。

歷史系所在復校後的情況，一般說來，由於規劃較早，故恢復系所十分順利，校友喬維熊曾回憶說到:

"那時，我受離京南下的王鍾翰之托，星期五下午必去看望洪煨蓮先生。在那裏常見聶崇岐、齊思和、翁獨健、張芝聯、劉子健、王愷增和在天津工作的侯仁之、楊思慎等老師和同學。大家除了交談抗戰的形勢，成都燕大復課後的情況，更多是計劃著抗戰勝利後燕大如何復校如何把燕大辦得更好。——。大家常常談得興高采烈，全然忘記當時還在日偽統治的淪陷區內。"⑦①

待正式積極開始復校行動後，復校核心的六人委員中，就佔了洪業，侯仁之兩位原歷史系所的教授，所以復員迅速，師資陣容也最爲齊整，校方公佈的全系所有關的師資陣容爲:

"二、院系負責人，教師及所開課程

——。

㈡文學院：院長梅貽寶，夏仁德（R. C. Sailer）曾代理，後由

---

⑦⓪ 同⑥⑦。

⑦① 同⑥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齊思和出任。

——。

3. 歷史系：

主任：齊思和

教師：齊思和（中國上古史、美國史、西洋現代史）

翁獨健（西洋通史、東亞近代史、俄國史）

聶崇岐（宋史、中國通史、中國政治制度史）

鄧之誠（秦漢史、隋唐史、明清史，導師，不開課）

陳觀勝（佛教史、印度史）

貝盧思（Miss L. Burtt，西洋通史）

許大齡（中國通史）

裴文中（考古學）

周一良（佛教史）

鳥居龍藏（考古研究，指導研究生）

侯仁之（現代地理學）"⑫

而與歷史系所關係最爲密切的校方另外兩個單位，即"哈佛燕京學社"與"引得編纂處"，其負責主管，前者由陳觀勝、聶崇岐出任，後者則由聶崇岐、王鍾翰出任，而此三位俱是燕京歷史系所出身者。⑬

至於燕大文學院共同必修科目及歷史系必修科目，民國三十四年(1945)，燕大報部核備文中的記載，亦表列於後⑭：

---

⑫ 王百強輯，〈燕大北平復校後的行政負責人與教師陣容〉，文收燕京大學校友會編，《燕京大學 1945－1951 年級校友紀念刊》，北京，1994 年。

⑬ 同⑫。

⑭ 《教育部高等教育檔——燕京大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學院共同必修—52學分		
科目		學分
三民主義		4
倫理學		3
國文		6
外文		6
中國通史		6
世界通史		6
哲學概論		4
理則學		3
科學概論		6
政治學 經濟學 社會學		三選一
十	科	52

歷史系必修—32至34學分	
科目	學分
中國斷代史	6
中國斷代史	6
中國史學史	3
西洋近世史	6
史學方法	3
中國政治思想史	6
畢業論文	2－4
七科	32－34

就復校後的歷史系所的之恢復情況言，系務運作很快地就上了軌道，有資歷深，經驗足的洪業、鄧之誠兩位教授坐鎮，又有學成歸國服務青壯校友的大量投入，燕大歷史系所絕對有再登戰前盛況的能力，此階段在燕大歷史系就讀的同學李光霽先生，有〈回憶燕大歷史系老師們〉一文，文中提到：

> “歷史系老師們的教學各有特色，言傳身教，諄諄教誨，有如昨日，記憶猶新。鄧先生講課，有根有據，有幾分材料講幾分話，絕不講空話，特點是“準確”。齊先生講課，提綱挈領，條理清楚，生動有趣，特點是“簡明”，“幽默”。聶先生講課，特點是“如數家珍”，左右逢源”。講究。“掰開了，揉碎了，爬梳出一些有價值的結論來”。周先生講課“透切明白”，列提綱，用卡片，不急不慢地逐個說明問題。侯先生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課，侃而談，有聲勢，有氣派，引人入勝，——。”⑮

而現任教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余英時教授，亦以曾爲燕大歷史系學生而回憶說到：

“洪先生晚年對他在燕京大學所培養出來的幾位史學家常常稱道不置，如齊思和先生的春秋戰國史，聶崇岐先生的宋史，翁獨健先生的元史，王鍾翰先生的清史，都是洪先生所激賞的，其中尤以對聶先生的情感最爲深厚。洪先生認爲聶先生不但學問好，人品更是高潔。我個人曾在燕京大學歷史系讀過一個學期，那時系主任正是齊先生；聶先生的“中國近代史”和翁先生的“歷史哲學”都是我修過的課程。以我親身體驗而言，我覺得洪先生對他們幾位的推許絲毫沒有溢美之處，決不像汪漁洋說白香山推重元微之那樣，乃出於“半是交情半是私。”⑯

但自抗日戰爭勝利後，燕京大學雖然順利復校，而不到一年的時間，中國整個政治局勢起了極大的改變，國共之間的對抗越來越烈，屬於教育單位的燕大也無可避免地捲入了這場政治的紛爭中，多少影響到正常的教學工作；待民國卅八年（1949）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在北平成立，改北平爲北京，並且以北京爲其首都；新政府成立後，燕大與其他的公私立大學，方告要在教育教務上再出發，又遇上新政府要收回教會學校教育主權的問題，⑰ 到次年（1950）朝鮮發生戰爭，中共在戰爭吃緊時，也投入了這場“抗

⑮ 李光霽著，〈回憶燕大歷史系老師們〉，文收燕京大學校友會編《燕京大學1945－1951年級校友紀念刊》，北京，1994年。

⑯ 余英時著，〈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文收《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一年），頁272。

⑰ 陳學恂主編，《中國教育史研究——現代分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380－3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美援朝”的戰爭，使中共與美國之間處於敵對交戰的狀態，中共教育部根據政務院《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構及宗教團體的方針決定》，發佈《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教會學校及其他教育機關的指示》，燕大是十七所接受美國教會津貼的高等學府中最主要的一所，因此燕大全校爲應付此一大指示，又一次影響到教學的正常性。待中共建國後的第三年(1952)，燕京大學再遇到新的一波大挑戰，亦即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方案的實施，在此調整方案中，奉令以原清華大學的文、理、法三學院各系及燕京大學的文、理、法三學院各系，都併入原北京大學；而燕京大學的工學院則併入原清華大學，如此一來，原爲私立大學，尤其又是教會大學的燕京大學以院系都被幷入了北大與清大，本身變得已無院系，故而“順理成章”而撤消了原來燕京大學的建制，[78] 而原有的秀麗又頗具規模的校址，就由原北京大學遷移過來使用。燕京大學至此後就變成一個歷史名詞了。

四、小　　結

由基督新教教會所支持創辦的燕京大學，其中的歷史系在創校後就成立，堪稱是燕京的元老系所，而三十餘年後因燕京全校遭到合併而告結束，因此歷史系可稱得上是與燕京大學同終始；有三十餘年校齡的燕京大學，對其元老系所的支持自不遺餘力，使歷史系所在穩定中得著良好的發展，校方當局不但以充分的財力支持系所的圖書收藏工作，也充分支持系所當局延聘優良師資的計劃，更有甚者，當系方有栽培優秀學生深造以培訓未來的師資計劃時，校方亦大力配合並促成之；而對歷史系所發展十分相關的引得編纂處、哈佛燕京社兩單位，也是全力的支持；而《燕京學報》、《史學年報》與各種《引得》的編纂印刷與發行，校方也是支持到底，使歷史系所的師生研究成果不斷地有園地與機會發表，這對燕大歷史系所日後的成長，能獲致外界的讚譽與肯定，燕大校方的鼎力支持實是其中具關鍵的因素之一，而系內洪煨蓮、

---

[78] 同[77]。頁3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鄧之誠、顧頡剛等幾位教授全力的投入系務，在教學與研究等方面，啓迪學生，教導學生亦是關鍵因素之一。總之，燕京大學的歷史系所，善用了教會大學中幾項優良的條件，如豐富的財力資源，良好的對外關係，靈活的校務行政，小班的精英教學，具傳教士犧牲熱忱的全力投入教學，融洽的師生關係，使其起步雖是艱辛，中途還遇著不可抗的中日戰爭之紛擾，但仍然能克服各種的困擾，卒能在三十餘年的歲月中，培育出爲數不少的歷史研究方面與教學方面的人材．對五十年代之後的歷史學界，乃至海外的中國史領域，產生重大的影響力。對於培育歷史學方面的後進人材，提及與稱道的文章最多，[79] 王伊同教授的有關記載最爲詳盡周全，在其追念燕京歷史系所洪煨蓮教授的文章中，有如下的說明：

> "先生嘗戲作"點將錄"，圈定親教誨而學有成者數人。茲就所憶，默誌如次：
>
> ＊齊思和，字致中，治戰國史，已故。
>
> ＊鄭德坤，治考古學。
>
> 張天澤，治中西海上交通史，已故。
>
> 瞿同祖，字天況，治中國社會史。
>
> 朱士嘉，字蓉江，治方志學。
>
> 杜聯喆，治明清史。
>
> 余協中，治通鑑，已故。
>
> 馮家昇，字平伯，治遼史，已故。
>
> ＊鄧嗣禹，字持宇，治制度史。
>
> ＊翁獨健，治元史，已故。
>
> 聶崇岐，字筱珊，治宋史，已故。

---

[79] 如余英時教授、劉子健教授、王伊同教授、王鍾翰教授、翁獨健教授、周一良教授等所著的專文中都有所提及。又陳毓賢著，《洪業傳——季世儒者洪煨蓮》一書中亦有描述，見該書頁 2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觀勝，治佛教史。
＊周一良，字泰初，治魏晉南北朝及日本史。
侯仁之，治歷史地理。
王鍾翰，字君墨，一字念黃，治清史。
劉子健，別號黑馬今盧，原籍貴州，因以黔驢自戲；治宋史。
張芝聯，治歐洲史。
＊伊同幸居其末，然薰蕕同器，媿謝未遑也。
［＊］哈佛哲學博士"⑧⓪

觀之上文，所言燕大歷史系所的成就，實足以和國內其他具歷史地位的北大與清華並相齊驅，而此段說明，在五十年代後投身中國歷史研究的後學者，也都能感覺實非溢美之詞。

⑧⓪ 王伊同著，〈先師洪煨蓮先生（1893－1980）〉，文收王伊同著《王伊同論文集（上冊）》（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七十七年），頁3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